

【台湾故事·名人寻踪之六】

□许志杰

到台湾之前我先认真地读了一遍殷海光先生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如先生在本书序言的开头所说：“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作基础，我试行导出中国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中国文化的展望》的社会视野与文化见识非常广阔，与他先前撰写的大量文章、著作一样，该书同样以其深刻的思想、缜密的逻辑、饱蘸激情的文字，影响着海外知识界和民众，在民主思想启蒙和光大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香港著名学者徐耀基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本书可以说是他学术兴趣上的一个大转变；是他思想心态上的一个大突破；我们甚者可以说是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的起飞。毫无疑问，以他的好思与智慧，他将在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中，由起飞而推向成熟。”

说来惭愧，在读这本书之前，对于殷海光先生虽知其人，却少知其事，所读著作也仅限于一些零零散散的评论和摘录。读其书，知其人，在台北我又专程拜谒了殷海光先生的故居，一个立体化的文化大家呈现在眼前，一个饱满的有血有肉的精神使者的形象跃然而立。

殷海光是湖北黄冈人，曾经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读书，师从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949年去台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大学做讲师的时候，殷海光首次将西方哲学引进台湾的教学之中，引起反响。1960年受“雷震事件”影响，殷海光有课不能上，也无法出国讲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大学也做出不再续聘殷海光的决定。这样的处境让学富五车、满怀抱负、才华横溢的殷海光激愤，却又无可奈何，不得不感叹：“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没有饿死已算万幸。”在身心备受折磨、人格无端被摧残的极度失望之下，这位生于1919年12月5日、自称“五四之子”的学术达人、精神先锋，生命的火车还没有开到50周岁，便于1969年9月16日因癌症病逝。



▲殷海光先生

【追根溯源】

□智效民

把中国比为“东方睡狮”，好像出自拿破仑之口。最初听到这个说法，还以为他的意思是说，睡狮一旦苏醒，其作用和影响可了不得。没想到后来读《江瓊卿笔记》，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江瓊卿笔记》是汪康年(字瓊卿)的笔札汇编。汪早年入张之洞幕，后来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并先后创办过《时事报》、《中外日报》、《京报》、《言言报》等刊物，是晚近以来的著名报人和活动家。在该书卷八“琴瑟寄庐类稿”中，有“睡狮”条曰：西人说中国是东方睡狮，我多次打听是什么意思，对方总是笑而不答。后来碰到一位驯兽师，才明白其中含义。驯兽师说，过去的驯狮办法，是让母狗哺育幼狮，让其在成长中具备狗性，以免伤人。后来发现这办法不灵，就改用涂抹鸦片的牛肉来喂它们。这样一来，狮子上台表演时，表面上还能张牙舞爪，大声嚎叫，实际上却少气无力，昏昏欲睡，就好像是在梦里说胡话似的，不会危及人的安全。于是，人们便把这种“始将长睡，永无醒时”的畜生，称之为“睡狮”。看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原本还可以给国人带来一点安慰和希望的“东方睡狮”之喻，竟然是这个意思！

说到鸦片，只要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中国泛滥成灾？其中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对此，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早已指出：外来祸患固然重要，但内政修明才是决定性因素。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已经是法制有名无实，民生痛苦万分，“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

“五四”之子

——殷海光和他的愚公河



殷海光先生的故居地处台北市温州街一条幽静的巷子内，是一座建于1945年的日式建筑物，占地面积250坪(一坪大约3.3平方米)，房屋的面积只有20坪。这里是殷海光1956年任职台湾大学讲师时的住宅，也是他最后的岁月被“软禁”的寓所。殷海光住进之后，开始绿化、修整这里，栽种了大量的树和花木，为女儿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小型的游泳池。最大的工程是他用三年多时间在庭院内挖出一条疏浚排水的下水沟，殷海光为其取名“愚公河”，取自“愚公移山”的故事。排水沟挖出的土，在旁边堆放成一个土疙瘩，殷海光称之为山，并取名“孤峰山”，一看便知这山名的意思是什么。山上还摆放了水泥做的桌椅，有朋友和学生来，殷海光就和他们坐在这里喝茶聊天，这是他生活中不可多得的惬意时光。

殷海光毕竟不像张大千、林语堂、钱穆那样，活着的时候就有声有势、身份地位尊贵，从而使这些名人的故居因人而贵，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原来的面目基本没有改变。殷海光先生就无此际遇，他仅仅是台湾大学的一位讲师，而且在人生的最后时光过着幽暗的“软禁”日子。所以，殷海光先生病逝后，他的故居无人管理，一度荒废，差一点就因建筑危险而被拆除。后来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终于在2005年被定为台北市古迹，受到保护，辟为殷海光故居。这是一个让很多人既感到欣慰又有些意外的“收获”，没想到在郁闷、折磨中离去的殷海光在近四十年之后能够重新回到他的家，回到他自己亲手挖出的“愚公河”畔，让喜欢他的人在这里怀念这位不屈的精神领袖，重温这位文化大师的思想风范。

故居内以介绍殷海光的生平事略为主线，放置书信与著作以及过去他们一家人在这里的生活照片，既有很浓的学术、

书卷的味道，同时散发着亲情的温馨和家的温暖。墙上挂着殷海光先生的照片，坚毅的目光透着一股英气，照片底下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猛地一看，这是一段很难读懂的文字，我想这是与殷海光一生紧密相关的，把人当人，也是殷海光先生一直为之努力的。据《中国文化的展望》出版说明，殷海光先生继承“五四”的传统与精神，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他称自己为“五四之子”，是“五四后期人物”。在台湾的20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他也因此受到当局的迫害。殷海光先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反法西斯战斗中，参加青年军，远到印度学习汽车驾驶技术，是当时第一位有研究生学历的中国抗日军人。

殷海光因为论点至高、文锋犀利，在学术界持不同观点者不少，其中就有著名学者陈鼓应。两人论战多年，最后还是殷海光主动抛出橄榄枝，熄战处和，尽释前嫌。这是轰动当时学界的盛举，至今为人称道。殷海光还培养了很多有名的学生，祖籍山东潍县的杂文家李敖是其中名气较大的一位。

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1号，“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1966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这是殷海光学生的一段回忆。如今，这里挂上了“殷海光故居”的铭牌，成为一个被追思的景点——追思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留下的那一抹绚丽的色彩。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多种)

“东方睡狮”考辨

厉害”的社会，所以才无法阻止鸦片的泛滥，才错过了一次“大胆接受西洋近代文化……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的机会。另外，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论及清军的状况时也说，这支军队不仅有吃空额、克扣兵饷等陋规，还要把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其中，浙江武官出售兵缺，广东绿营开赌收费，福建水师将战船租赁出去进行走私等现象尤为严重。于是，整个社会就像作者所感怀的那样：“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毒化着社会空气，腐蚀着人的灵魂。

这让我想到关于拿破仑的另一则轶事。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说过：“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许的……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他还说：“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而忠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想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对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

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伟大的国家”与“五百法郎”有什么关系，参照所谓睡狮之喻，我才发现“伟大的国家”云云，不过是一种反讽，那意思是说：“尽管他的国家将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只要给他五百法郎，他就会出卖自己的人格，变成你的奴才。”难怪那位驯兽师在解释睡狮的含义时，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贵国之大，犹狮子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看来，如果说鸦片是一种人体腐蚀剂的话，那么，贪污腐败则是一种社会腐蚀剂。驯兽师所谓“奚止于鸦片耶”的疑问，显然与这种社会腐蚀剂有关。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汪康年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如今，距离汪氏所处的时代又过去100多年了，他所谓“复民权、崇公理”的愿望，不断地有人提出，又不断地归于失败。大约十几年前，龙应台在比较了汪氏之语和李慎之的论述之后，曾有如下感慨：如果总是重复前人的痛苦，重复前人的努力，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说到这里，她也忍不住暴粗口说：“温习中国近代史，翻过一篇又一篇，不免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如果将石刻比作一部电影的话，《瘞鹤铭》无疑是其中时间跨度最大、明星阵容最强、传奇色彩最浓、美学价值最高、且涉及人与自然、文物保护、战争、悬疑、灾难等多项内容的国际大片。

被誉为“碑中之王”的《瘞鹤铭》残碑，珍藏于江苏镇江焦山碑林北侧的一座亭子中。“瘞”即埋葬，《瘞鹤铭》就是鹤主人写为一只死去的家鹤而写的墓志铭。为宠物写墓志铭本身就是一件不多见之事，而此碑的书法和背后的千年传奇故事，更令人心驰神往。

《瘞鹤铭》为摩崖刻字，北宋黄庭坚曾有“大字无过《瘞鹤铭》”之句，可见他对此刻石的推崇。该石刻字体浑厚古朴，虽为楷书，却带有隶书和行书之意；字形上大小悬殊，无拘无束；章法上，它那异乎寻常的从左向右书写的独特布局，更令其在同时代碑刻中显得“鹤立鸡群”。

从唐代镇江金山寺一位不知名僧人记录下来的《瘞鹤铭》全文看，该铭记载的是一位自称“华阳真逸”的南朝隐士，壬辰年在华亭得到一只仙鹤，两年后(甲午年)仙鹤在镇江死去。从鹤主人“苍天啊！你为何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仙鹤啊”的哀叹中，我们依稀能感觉到他那千年前的悲痛。主人用玄黄的丝绸包裹爱鹤之遗骸，葬于焦山之下，并在葬鹤的土丘旁撰铭凭吊，又请工匠将全文刻在焦山摩崖石壁上。

就是上文所说的这位不知名唐代僧人随手抄录的《瘞鹤铭》铭文，后来竟成为其原刻全文的孤本。几百年后，北宋学者刁越到金山寺看佛经，无意间从一部佛经中发现了这份被夹在经书中的手抄稿，从此，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来到焦山岛访碑题字，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陆游、米芾、郑板桥等。

为何这份手抄本竟成为《瘞鹤铭》原刻全文的孤本呢？约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瘞鹤铭》因遭雷击而崩裂为5段后坠入江中，直到三百多年后才有部分残石被打捞出水。故言自宋以来，人们看到的只是断落的残碑。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因在焦山水域修建运河，有工人从江中捞出一块断石，颇知书法的监工认为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瘞鹤铭》，并上报镇江郡守钱子高，钱命人在摩崖附近继续搜寻挖掘，发现了尚未落水的《瘞鹤铭》上半部。为了方便瞻观，就在崖边摹刻了一个复制品，令钱子高始料未及的是，这一举动竟成为日后碑文拓本混乱的滥觞。这个摹刻本，不但被当时的很多人当作原作临习，而且在北宋末年，后来的

【碑刻漫话】

《瘞鹤铭》：宠物墓碑的千年传奇

□杨加深

镇江知府据此制作了大量拓片，这些史称《府刻本》的伪本拓片，进而迅速成为官场上相互赠送的珍贵礼品。但也正是这个错误使《瘞鹤铭》名声远播。自宋至清，《瘞鹤铭》的拓本已达百种之多，除碑文内容不尽相同、字形字体略有差异外，其功能也由北宋末年的礼品逐渐变成了可以标价出售的商品。

正如书法史上许多国宝级的作品多遭遇“天灾人祸”一样，明洪武年间(1368-1398)《瘞鹤铭》残碑再次消失了。直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春，酷爱书法的苏州知府陈鹏年到镇江闲居，看到各种不同的《瘞鹤铭》拓本，陈鹏年也被弄糊涂了。他决心从江中打捞传说中的《瘞鹤铭》原石，以解决这个长期令他困惑不解的问题。同年冬，正值枯水季节，经过3个月的努力，《瘞鹤铭》残石被捞出水面，其中有完整文字81个，残缺字12个，计93个。这样，传说中的《瘞鹤铭》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现了。

早在日本的江户时期(1603-1867)，《瘞鹤铭》拓本就传入了日本，它不但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书道进程，也成为1937年日本侵华的掠夺目标。日本裕仁天皇的“金百合计划”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掠夺《瘞鹤铭》。从清朝开始，《瘞鹤铭》残石就被委托给摩崖边上的定慧寺保管。面对日本人的贪婪，在雪隐法师的带领下，《瘞鹤铭》残石被连夜移出，使之逃过一劫。直到1962年，5块《瘞鹤铭》残碑才被正式移入定慧寺边上的碑林，镶嵌在焦山碑林碑亭内。

据抄录的铭文记载，《瘞鹤铭》中有“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字样。古今学者曾对此铭的书写者做出多种推测，如王羲之、陶弘景、颜真卿、顾况、王瓚说、皮日休说等等。然而，从《瘞鹤铭》赞辞所用的韵脚看来，我觉得其撰文者应当另有其人。因为赞辞中的韵脚——真、声、辰、冥、莘、门、崩、明、宁、铭，本来并不属于同一韵部，却在铭文中莫名其妙地变得押韵了，这是明显的方言特点。而考察上述诸人的诗作用韵情况，均与《瘞鹤铭》之用韵不符。读《华阳国志》可知，当时的华阳之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所以，我建议对该铭文的撰文者和书写者的考察也应该同时考虑方言因素。试想，若非撰文者与书写者为同一人或同地人，又有哪一位书法家会肯为他人书写一首并不押韵的铭文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